

中国历史上的

ZHONGGUOLISHISHANG 云中天
DE DARONGHE 编著



大融合



全面记述中华民族的成长历程，
深刻揭示中华文明形成的内因，
热切展望中华民族的美好未来。



中国三峡出版社

中国历史上的大融合

云中天 编著



中国三峡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历史上的大融合/云中天编著. —北京:中国三峡出版社,2007.6
ISBN 978-7-80223-356-0

I.中... II.云... III.中华民族-民族历史-研究
IV.K2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70716 号

中国历史上的大融合

云中天 编著

出版发行:中国三峡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西城区西廊下胡同 51 号

邮政编码:100034

电 话:(010)52606692 52606693

<http://www.e-zgsx.com>

E-mail:sanxiaz@sina.com

印 刷:北京中兴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新华书店

版 次:2007 年 8 月第 1 版 200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787×1092 毫米 1/16

印 张:17.375

字 数:170 千字

ISBN 978-7-80223-356-0

定 价:30.00 元

中华民族的大融合是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

其一，经济因素；其二，传统的文化因素；其三，多民族的统一国家；其四，团结御侮，共同抵抗外来侵略的斗争精神，等等。多种因素相互作用，使中华各民族之间产生出强烈的民族认同感，从而凝结成为一个牢不可破、密不可分的共同体。

责任编辑：杨小虎
封面设计：田 禾

前言

几千年来,在中国古代文明滋生的这块东方沃土上,先后繁衍生息过许多民族,一些民族消失了,另一些民族又勃然而兴起。伴随着中国历史上各民族的多元起源与发展,以及统一、分裂、再统一的反复交替,古代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和相互借鉴,促成了中国各民族共同的历史进步。

然而,从严格的科学意义上而言,我国现代的以及在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所有民族,其血统都不是纯而又纯的,都曾经历过不同程度的融合过程。各民族共祖同源和多源多流的亲密关系,在历史上曾起过维系民族团结的纽带作用。如今,我们所讲的中华民族,是一个基于长期交流与融合而形成的具有丰富内涵的联合共同体。

对民族融合这个概念的理解,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在表述全球历史上民族消亡的途径和方式时,民族融合是指全世界建立共产主义社会以后,民族特征与民族差别逐渐消失,形成一个没有民族界限的人类整体的历史过程;二是把民族融合作为一种普遍的历史现象来看待,它是指历史上两个以上的民族,由于互相接近、互相影响,最终形成一个共同体的现象。我们在讲述历史上的民族关系时,通常是在后一个层面上来使用民族融合这个概念的。因为,民族的融合是多民族国家的普遍现象,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古今中外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变化、发展,都与民族融合紧密相关。

从我国以及世界上的民族关系来看,一个民族同另一个民族进行融合,存在着两种情况或方式。一种是采取政治强制手段把一个民族合于另

一个民族；一种是通过经济、文化的作用，使一个民族经过自然的过程合于另一个民族。为了比较妥当和科学地表述这两种客观存在的情况或方式，人们又习惯地把通过政治强制使一个民族合于另一个民族的情况称为同化；把通过经济、文化的作用使一个民族自然地合于另一个民族的情况称为融合。在中国多民族的关系史上，既有强制同化，又有自然融合，相互之间分分合合，聚聚散散，错综而又复杂。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它不仅以其悠久历史表明了自己坚韧的活力和罕见的凝聚力，而且必然在未来年代里显示出前所未有的勃勃生机，在全球性的现代化进程中走在世界的前列。现在，对中华民族融合的问题进行全面、系统、深入的研究，其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是不言而喻的。有鉴于此，笔者不揣冒昧，决心编写一本关于以民族融合为题材的著作，从历史的角度探讨中华民族融合形成的诸种因素及其发展的内在规律。笔者力求搜罗比较丰赡的史料，据此作出明确的判断，使其升华为理性的认识，以史论结合的形式来阐明中华民族融合形成与发展的若干基本问题，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略尽绵薄之力。

云中天

2007年5月

目 录

第一章:经济大融合

第一节:先秦:各个民族地区之间的经济交往	3
第二节:秦汉:各个民族经济交流发展的新阶段	18
第三节:魏晋南北朝:动乱时期各民族经济相互依存	31
第四节:隋唐:经济交流的大繁荣	36
第五节:宋辽西夏金:对峙时期的经济往来	49
第六节:元明清:经济发展空前繁荣	59

第二章:文化大融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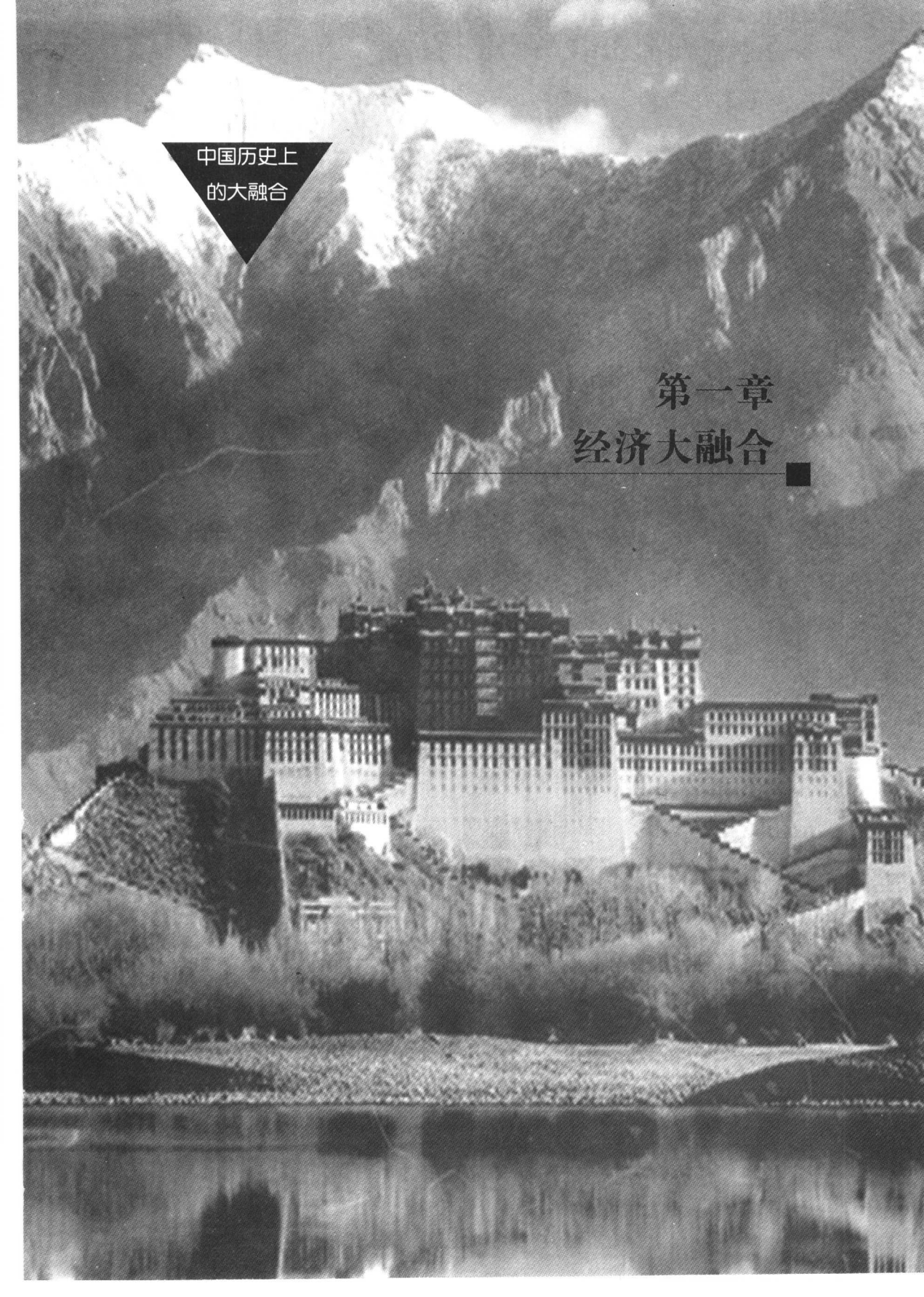
第一节:远古:远古人类及其文化	83
第二节:先秦:各民族间的文化交融	89
第三节:秦汉:一统格局下的文化融合	92
第四节:魏晋南北朝:动乱时期的文化交融	107
第五节:隋唐:鼎盛时期的中华文化	120
第六节:宋辽夏金元:文化的各异与融会	137
第七节:明清:多民族文化的融合	147

第三章:民族大融合

第一节:远古:早期少数民族与华夏族的融合	159
第二节:夏商周:广大中原地区的民族融合	166
第三节:秦汉:民族融合彰显巍然大国风采	175
第四节:魏晋南北朝:北方民族的迁徙与融合	180
第五节:隋唐:斗争与和亲促进了民族融合	189
第六节:两宋:民族融合的新动向	195
第七节:元:民族杂居与民族融合	200
第八节:明清:民族融合的新变化	206
第九节:新中国:五十六个民族大团结	211

第四章:斗争精神大融合

第一节:第一次反侵略斗争的大胜利	217
第二节:收复台湾彰显反殖民统治的决心	223
第三节:鸦片战争掀起了反侵略斗争的高潮	230
第四节:各族同胞风雨同舟共御外侮	238
第五节:各族同胞为中华民族存亡浴血奋战	255



中国历史上
的大融合

第一章 经济大融合

第一节

先秦：各个民族地区之间的

经济交往

尧舜时期中原地区

与周边各民族的经济交流

在我国幅员辽阔的土地上,由于自然环境的差异,不同地区、不同民族存在着不同的经济类型,是造成产品在地区间和民族间明显差异的重要原因。所以,我国各地区和各民族之间在经济上互通有无很早便已经发生。

传说在我国神农氏时代各部落之间的交换已有较大发展,据一些典籍记载,到了尧舜时代,氏族部落之间的交换有了进一步发展,交换的区域范围也越来越扩大。因为到了原始社会末期,我国各地的农业、牧业和手工业都得到了全面的发展,从而促进了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之间交换的发展。

交换虽是以产品的地区差异为基础,但同时又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发展的。我国中原地区由于自然条件优越,不仅有开阔的平原,而且土壤疏松肥沃,便于进行大规模的开发。所处的地理位置又得天独厚,交通便利,易于吸收和融会邻近地区和民族先进的东西。所以中原地区最早进入阶级社会,并从部落联盟形成国家。

夏朝时期中原地区

与周边各民族的经济交流

夏朝是我国境内建立的第一个王朝,并且开始出现夏族的名称。随着夏朝的建立,其经济发展水平也随之提高。如农业知识就比原始社会有所提高,发明了节气和干支记日法,其对农业发展所起的促进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夏王朝统辖的地区,主要是河南省中西部的郑州附近和伊、洛、颍、汝诸水流域,以及相邻的山西南部汾水下游一带。在古史传说的夏王朝疆域内已发现有关遗址近百处,其中代表性的遗址是河南偃师二里头,以该遗址命名的二里头文化,成为典型的夏代文化遗存。此外经过发掘的重要遗址有洛阳东干沟、姪李、东马沟,陕县七里铺,临汝煤山,郑州洛达庙和山西夏县东下冯、翼城感军等十几个地点。

二里头文化的考古发现表明,夏代居民的经济生活以农业为主,农具主要是石器,其中石铲、石镰的数量最多,另外还有蚌铲、骨铲和蚌镰等。木质的、耜一类工具也是日常使用的农业工具。主要农作物仍然是在新石器时代基础上大量生产的粟、黍一类。

这时,饲养的家畜有猪、狗、鸡、马、牛、羊等,可谓“六畜俱全”了。由于农业生产已能提供较多的剩余产品,饮酒之风比较普遍,在一般平民的墓葬中也常见觚、爵等酒器随葬。

夏代的农业经济比新石器时代发展更快,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在龙山文化末期,黄河流域多次洪水泛滥成灾,禹在各部落的推戴下,受舜的委托治理洪水,“尽力乎沟洫”,变水害为水利。在夏代,由王室统一部署水利灌溉工程,使农田得到了更为有效地利用。在这种情况下,

农产品的产量有较大增长。

第二,由于数千年从事农业生产的经验积累,夏人发明了四时节气和干支纪日法,制定了为后人广为传颂的《夏时》、《夏小正》等历法,以当时可能具有的季节气候和其他物候知识来指导农业生产的各个环节,从而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生产。

长期的生产和生活实践,使人们逐渐认识到植物的生长荣衰、动物的栖息繁衍都有一定的规律,这种规律同一年四季气温变化的周期之间有一定的关系,因而产生了物候知识。中国是一个以农业立本的大国,为了不误农时,从远古时代起氏族成员就注意利用物候知识来指导安排生产了。中国第一部关于农业生产和物候之间关系的著作《夏小正》,在奴隶社会初期出现,正是农业经济有显著发展的结果。

由夏人总结传述经后人整理的《夏小正》,文字古朴简练,内容相当丰富。全书数百字,按照一年十二个月分别记载物候、气象和重要的政事,特别是关于农业和畜牧业经济方面的耕种、修补农具、整理田界、采集、蚕桑、养马等都有具体的描述。这部最早反映中国农业经济的文献,是十分珍贵的文化遗产。

第三,夏代的农业生产工具比龙山文化时期有了较大的改进。不仅由于奴隶的密集型劳动使大批农业生产工具得以改造,而且集中了各地的先进手工业技术,改进了传统工具的质量,出现了一些更更为效的新式农具,提高了劳动效率,从而增加了农作物的产量。

第四,在一定范围内,新兴的奴隶主贵族统一管理的集权政治,使原来分散在各个部落的富有生产经验的人有了集中交流农业先进技术的条件。各地原始部落先进经验在夏王朝疆域内得以迅速推广,促进了生产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成为农业和畜牧业发展的巨大的动力。

由于上述原因,夏朝的经济的发展较之龙山文化时期有了明显的飞跃,黄河流域率先进入了古代的文明社会,出现了规模相当大的都市,农业和畜牧业产品有了更多的剩余,从而转变成为用于交换的商品,出现了城市经济和商品经济的萌芽。

当时夏国的周边还有许多诸侯小国和与夏族不同的许多少数民族。关于他们之间的经济往来,囿于史料,知之甚少。但这种经济交往应该是存在的,如《尚书·禹贡》说:“禹别九州,随山浚川,任土作贡。”在古代朝贡往住就是一种特殊的经济交流方式。

商周时期中原地区

与周边各民族的经济交流

商朝是继夏朝在中原地区建立的第二个王朝。在夏朝的基础上,商朝已成为一个比较发达的奴隶制国家。农业生产工具已不是石头制品,而是金属工具(在今河南省境内曾出土了商代铜铲等物),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全面进步。

商王朝统治中原地区时,周围各地的诸侯国和部落的经济也都有程度不同的发展。当时中原对周围各地的影响很大。一些先进的生产经验和技術能较快地在各地传播;一些诸侯国和部落的地方经济特色,也与中原不断交流,比如江南的制陶和纺织技术很发达,通过各种形式的交流促进了中原地区的制陶业与纺织的发展。广泛的经济交流与融合,使商代各民族经济呈现出空前活跃的局面。

(一)长江流域的经济发展

公元前15世纪前后,长江流域各地的氏族部落集团已先后建立了自己的城邦,进入奴隶制经济的发展阶段。商王朝巩固了在中原地区的统治地位之后,其势力逐渐向四方扩张,很快控制了长江中上游一带,尤其是长江中游,已直接受到商王朝的管辖。

政治、军事上的统一,必然为经济生产的协调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从

而使各地的农业和手工业发展趋于同步。在长江中游考古发掘的收获表明,当时长江中游和洞庭湖、鄱阳湖一带与中原经济的关系密切。

长江中游一带的商代遗存,主要有湖北黄陂县叶店的盘龙城遗址、江西清江县的吴越遗址和新干县大型墓葬、湖南省宁乡县的商代居住遗址及铜器群等等。这些发现包括城市、村落、墓地等,基本上能够反映出长江流域商代社会经济的发展概况。

1974—1976年发掘的盘龙城遗址和几乎同时发掘的吴城遗址,清理出一批墓葬、居住址、窑址和宫殿,出土了比较丰富的遗物,从中可以看出商代的江南农业、手工业、建筑业的发展情况。

盘龙城遗址是商代中期的城市遗址,年代约为公元前15世纪前后。在这个遗址中发现了“茅茨土阶”的宫殿基址、墓葬区、居民区和手工业作坊区,在出土的大批商代中期遗物中,包括许多刀、铤、锯、凿等青铜工具,有少量工具是手工业作坊中奴隶的随葬品,有些工具则是在贵族墓中被发现的。

盘龙城考古发掘的遗迹表明,这座商代中期的城市之内仅有宫殿群,贵族墓群和平民墓群分别在城外,其中城东的李家嘴的大型贵族墓葬,在雕花木椁外有殉人,殉狗则置于棺底腰坑中,随葬品有鼎、鬲、圈足盘、小盘、盂、盥、觚、爵等青铜礼器23件,还有钺、戈、矛、刀等青铜武器,戈、笄等玉器及有地方特色的印纹硬陶尊、瓮等,此外还有一些其他陶器。根据墓葬形制和随葬品来看,这座墓的主人应是一个方国的统治集团核心人物。与之相比,城西楼子湾一带的普通贵族墓规模就小得多,虽然也都有棺、椁和腰坑,有殉狗,但每个死者只有一件或几件青铜器随葬,并往往有戈、钺、斧、铤等青铜武器和工具,以及一些陶器、石器随葬。城北杨家湾一带的平民墓,墓圻窄小,仅容一人,有棺无椁,除了殉狗外,只有少量陶器随葬,个别墓中只有1件小型铜器如爵之类随葬。

吴城遗址是商代中晚期的城址,面积约4平方公里。在这个遗址中,清理出当时人们居住的房屋残迹和一批窖穴、灰坑、陶窑,同时还发掘出13座墓葬。

遗址出土了不少生产工具,石器有斧、铤、凿、刀、铲、镰、网坠等,还有

石戈、石镞及青铜制造的刀、斧、戈等武器和工具，也发现了陶刀、陶网坠等工具。

以这个城址考古发现命名的吴城文化，大部分陶器与中原地区的商文化有密切的关系。陶器中有鬲、罐、豆、盆、碗、尊等，还有一些陶塑装饰品。这批陶器表现出的地方特点是印纹硬陶和原始瓷器的广泛使用，以及纹饰中大量盛行圈点纹。遗址中有的窖穴内周壁经过焙烧或粘附着铜渣，坑内出土石范，表明附近有铸铜的作坊。当时人们制造青铜器的方法与中原一带有较大的差异，即用石范来铸造青铜器。遗址中出土石范很多，较大的就有 30 多块，主要是工具范和武器范，少量是容器范。在部分陶器和石范上发现有刻划的文字和符号。

吴城遗址发掘的 13 座墓葬，都是平民墓，长方形竖穴，随葬品为陶质的鬲、罐、豆等。盘龙城和吴城遗址的发掘，证明商代中期以后江南的经济已经比夏代时期的石家河文化有了明显的发展，其中取得突出进展的是手工业生产。盘龙城遗址出土的原始瓷器尊、瓮等，在中国陶瓷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为瓷器制造迈出了关键的一步。吴城遗址的文化堆积分为时间不同的三期，随着时间的推移，原始瓷器数量渐增，一些收割稻谷用的刀已经是原始瓷制作的了。从青铜器、印纹硬陶上刻划的茧纹、蚕纹、绞丝纹等来看，当地的纺织业也有相应的发展。以石范铸造青铜器则表现出鲜明的地方经济生产特色。所有这些成就，说明商代的江南经济发展是独具一格的。1989 年发现的江西省新干县程家沙洲村商代大墓，进一步表明江南经济的发展程度。这座商代中期偏晚的大墓，随葬品极为丰富，计有青铜器 480 余件，玉器装饰品 100 余件，陶器近 300 件。其中尤以青铜器最引人注目，其数量之多、造型之奇、品类之全、纹饰之美、铸工之精，不仅为江南地区所罕见，在整个商代社会中也令人惊叹的。这批青铜器中包括礼器、乐器、兵器、农具、手工工具及日常生活用具，其中以兵器和各种生产工具数量最多，成为一个重要特色。

新干商墓出土的青铜器，一方面有些器物的造型及纹饰与中原商代遗址出土的相近或相同，说明这个方国与中原地区有着密切的联系，曾受到